

75
1945-2020

五七干校拾零 (三)

北京 59届 郭玉金



当地老乡心目中的五七干校

息县老乡认为，北京来的干部都挺有钱的。老乡这么说：“别看他们穿的破，有的还打补丁，那是装穷！连养猪的都挣300元，还带一块大金表。”他说的是我们学校一位教授级副校长马乃庶，那时叫作“留用工资”，的确是300多元。那个年代300元是部长级工资吧。这位校长文革初期就“靠边站”了，有没有进“牛棚”我不清楚。在干校他被分配养猪，实际上他年纪大了，也干不了什么活，可能是让他坐在猪圈外面放哨吧。附近老乡经常跑到干校的菜地里拣白菜帮子之类，说是用来喂猪，就经常和马校长聊天。虽然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五、六十元的工资，有个别人在57年被错划成“右派”的老师，只拿40多元，但和老乡比较，我们的确也算是富裕的，属旱涝保收。

干校大家庭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极为单调的集体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开会。但会议比在北京时少多了。周末一起上自由市场买点小鱼小虾之类。农民都是偷偷摸摸抓点小鱼小虾自己吃，拿到“市场”上卖的话，算非法牟利，我们找到几个关系户，经常跑他们家买鸡蛋等等。对于那些没有家庭牵挂的人，这种生活也挺快活的，有空还可以读书、学习，省得天天被大字报高音喇叭、批斗场面所烦扰。可是有好多人都免不了天天牵肠挂肚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学，无法带到干校，只能托付给老人或邻居，或请保姆照看。有的孩子没有家长教育管教，在社会上变坏了；有的孩子生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留下后遗症。我的孩子也放在爷爷奶奶哪里代为抚养，那时候夫妻两地分居是

很平常的事情，我们是三地分居。

农村工作组

大约是6月份左右，军宣队负责人召集我们10多个人开会传文件，决定从五七干校抽调一些干部，分别到偏远的农村去参加“农村工作组”，名单上居然有我！上帝呀，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在动员报告中，军宣队大概是这么说的：……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好机会，这是锻炼你们独立工作能力的好机会……！听了这些话，耳朵都快起老茧。我心中郁闷，欲哭无泪，但有什么办法？服从、服从，还是服从。我和一位69届应届毕业生徐雪华同学在一起，被派到河南固始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原来属大别山区老革命根据地，离息县五七干校比较远，而且交通也不方便。

我们俩乘长途公交车，颠簸几个小时

后，在固始县城下车，县革委会派人接我们，再坐拖拉机到大队办报到，然后有人帮我们独轮车把行李拉到一个小学校后面的一个小土坯房里。看得出来这间屋已经好久没有人住了，专门给我们收拾了一下，房顶上的蜘蛛网还没来得及打扫干净。这房子的主人是什么人？地板是黄泥地，没有铺砖，临时给我们摆了两个小课桌和两把椅子。我和小徐睡在一个土炕上，炕上铺上一些稻草，一个破草席。小徐是北方人，没有带蚊帐，好在我带的蚊帐够大，可以把我们姐儿俩“安全”地罩上。蚊子算是挡住了，可是从第一晚开始，我们就天天给跳蚤“输血”，每天半夜里被咬得忍无可忍时，就开始打手电和跳蚤们展开搏斗。老乡教给我们如何抓跳蚤，手指抹上吐沫先黏住它，然后用左右拇指一挤，每天都是

血迹斑斑的，我们身上可以说是被咬得体无完肤。除了夜里睡觉时挨咬，白天坐在椅子上或者炕上，我们的腿和胳膊也未能幸免。太猖狂了！小徐稍微比我好一些，也许因为我是“O”型血，跳蚤、蚊子都对我特别青睐。那个年代那有卖防蚊、防虫药水呀？我曾问老乡挨不挨咬，他们都说挨不挨咬，而且还开玩笑说，俺们这儿的蚊子和跳蚤专咬外地人，尤其是城里人。

我们俩的任务是下基层了解情况，收集材料，说白了就是访贫问苦吧。大学时代我们也参加过“四清”运动，那时是和农民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次只同吃、同劳动，不和农民住一起。

队里把我们分到各家各户轮流“派饭”，派到那家，我们每人给他们家交一元钱和一斤粮票。在给我们的“派饭”名单上，除了写上户主姓名外，还有阶级成分、政治面目、家庭成员等等。头一回去时，派到的哪一家会过来接我们，以后我们就认得门自己去了。

他们称呼我们是“北京派来的干部”，只字未提“五七干校”。所以我感觉我们不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俨然是以“工作组”

